

杭商研究丛书

辛薇◎主编

杭商

与杭州社会建设

Hangzhou Merchants
and Society Construction of Hangzhou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 商 与 杭 州 社 会 建 设

Hangzhou Merchants and Society Construction of Hangzhou

辛 薇 主 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商与杭州社会建设/ 辛薇主编.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81140-511-8

I. ①杭… II. ①辛… III. ①商业史—研究—杭州市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5252 号

杭商与杭州社会建设

辛薇 主编

责任编辑 赵丹 周敏燕

封面设计 李军

责任校对 尤锡麟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85 千

版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511-8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序 言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的大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广泛利用后发优势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开始遭遇后发劣势,包括体制和制度、资源和环境、素质和能力等的限制与挑战。进入经济和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必须从单纯或过度的经济数量增长转向经济质量提高以及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国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统一性和行政化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使个体、群体和区域,尤其是城市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日益突出。正值此时,《杭商研究》丛书(包括《杭商与杭州经济竞争力》《杭商与杭州社会建设》等)即将出版,显得颇有意义。

杭州的历史源远流长,秦始皇过钱唐,隋开皇建州城;杭州的文化丰富灿烂,白居易、苏东坡留诗篇,岳飞、于谦添英气,周木创万松书院,康熙题西湖十景;杭州的山水多姿,风景优美,淡妆浓抹总相宜。江南好,最好是杭州。马可·波罗称杭州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乾隆六次下杭州,孙中山三临白云庵,毛泽东四十次到杭州。新时期杭州城区跨江发展,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着力打造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创业创新之园。杭州造就杭商,杭州文化塑造杭商品格。

杭商品格,既体现“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精神文化,也体现茶叶、丝绸、剪刀、中药和电子商务等杭州经济文化,更体现以人为本与顺应天时、生活享受与工作创造,以及人文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实体与虚拟等杭州复合文化。杭商具有诚信与敢为、务实与谋略、沉稳与创新等品格。杭商品格

不仅是杭州文化的体现和结晶,而且具有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其多重的两极展开与统一的复合品格,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包容性、创造力、超越力,加上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省内外浙商的精英分子,可以超越资本,对杭州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杭商推进杭州经济社会转型提升,以及与杭州协同发展,其核心是形成新的健全、协调的主体—生态关系。杭商不仅是市场和经济主体,也是社会和文化主体,其主体性能是比较健全的。不仅如此,杭商还在不断丰富主体内涵和提高主体性能。但是,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后,杭商与整个浙商一样,已经成为企业财产所有者和社会富有阶层,即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变得保守起来,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与现行体制和制度相安共处,甚至成为现行体制和制度的维护者,形成保守和趋于衰落的主体—生态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要实现转型升级与持续发展,就必须突破现行体制和制度的障碍,形成新的公正有效的社会和政治生态。杭商主体性能的提高,必须突破自身与环境的双重限制,树立改革意识和增强企业家精神,成为新的改革者,超越自身既得利益的束缚,推进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只有持续、深入和彻底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们的远大未来,才有新的积极向上和不断提升的主体—生态关系,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改革,特别是与政府协同推进改革,是杭商和浙商当前以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最大的社会责任。

同时,杭商要推进杭州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还必须成为新的建设者。其核心与关键是要制定和实施新战略,即从经济数量增长战略转变为经济质量提高战略,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经济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战略,从手段战略转变为手段与目的统一战略,从竞争力战略转变为发展力战略。这其实也就反映了生态文明的规律与要求。生态文明集中和突出地反映后现代化的文明内涵,是超越于工业文明的先进的文明形态。杭商应该且可以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走在浙商和中国的前列。这就需要杭商有建设者的责任心,发挥“杭铁头”精神,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有效监督,尤其是来自社会民众的有效监督,以增进民众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导

吕福新

2012 年 4 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杭商的历史渊源:秦汉至民国的历史考察	1
一、秦汉至吴越国时期杭商文化的萌芽	1
二、宋代杭商文化和杭商团体的形成	4
三、元代杭商——一个积极拓展的时期	14
四、明代杭商出现的新特点	18
五、清代杭商的发展与变革	24
六、民国时期的杭商	30
第二章 杭商创新能力研究	38
一、企业创新能力相关文献综述	38
二、杭商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41
三、制约杭商创新能力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52
四、提升杭商创新能力政策与措施	55
第三章 杭商民营企业继承制度实证研究	63
一、绪论	63
二、杭商民营家族企业继任与传承的实证分析	73

三、万事利集团与东华链条集团的案例分析	91
四、典型家族企业的传承模式分析	98
五、家族企业传承过程的影响因素总结	104
六、结束语	111
第四章 杭商企业社会责任与杭州社会运行关系研究	117
一、杭商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渊源及其嬗变	118
二、杭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促进社会良性运营	126
三、当前杭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的主要问题	137
四、培育和促进杭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途径	141
第五章 杭商伦理思想研究	151
一、杭商伦理界定	151
二、杭商伦理的特征和组成	157
三、杭商伦理的主要内涵和价值取向	160
四、杭商伦理的未来走向	174
第六章 杭商政治参与研究	178
一、杭商政治参与的若干概念	178
二、杭商政治参与的基本现状	180
三、杭商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	190
四、杭商政治参与中的突出问题	197
五、杭商政治参与持续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对策	199
后 记	204

第一章 杭商的历史渊源：秦汉至民国的历史考察

一、秦汉至吴越国时期杭商文化的萌芽

从城市的历史沿革而言，杭州在秦代就设为钱唐县，西汉初钱唐县仍属会稽郡管辖，但在文帝时已作为会稽西部都尉治所，政治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当时的陆地尚狭小，易受海潮侵袭，土壤积盐，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居民常饮卤水，并不是一个很适宜生活的地方。

自秦代以来对已有江南水道的疏凿和海塘的持续兴筑，使得钱唐地区的交通环境有所改善，与吴地联系更为便利，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西汉后期，钱唐地区的人口不足万户，至东汉后期已“有户万五千，口逾六万”。人口的增加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也成了商业繁荣的基础，此时的钱唐应该已经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掀起了新一轮开疆拓土、发展生产的高潮。随着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了江南，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贸易迅速繁荣。西晋惠帝时，会稽内史贺循在原山阴水道的基础上开凿了浙东运河，便利了吴越地区的贸易往来。地处吴越之交的钱唐作为一个津渡要地，在商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使得钱唐在当时很可能存在做中转贸易的商人，为商旅提供服务的商人也会比

较多。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短命的王朝，却为杭州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隋文帝废钱唐郡，置杭州，始定杭州之名。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江南运河开凿，并与早在西晋时期已经贯通的浙东运河相连。这是杭州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随着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杭州成为水运枢纽、江海门户，从杭州不仅能够直接到达金衢、宁绍等浙江腹地，而且可达太湖、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流域等诸多地区，增进了杭州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巨大提升，商贸日渐繁荣。《隋书·地理志》描述当时的杭州“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①。可见当时的杭州已是各类商品的集散地，杭州已经从商品的中转之地转为集散之地，“商贾并辏”四字不仅说明商业繁荣，也说明此时杭州的商人以外地商人为主。

① 魏徵等：《隋书·地理志》（卷三〇），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② 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八〇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文苑英华》（卷六六〇）。

进入唐代，杭州的商业因运河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确定了东南名郡的地位。杭州城市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有了“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②的大都市气象。宪宗时期，“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③，一跃成为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而每年五十万缗的商税更是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24，加上数额巨大的盐税，更使杭州成为当时的财富之地，大小商人云集于此。唐代不仅是杭商经济实力大增的时期，也是杭商文化萌芽的时期。

在唐代，杭州作为城市的吸引力随着城市环境的改善而不断增强，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当时的西湖不仅作为杭城淡水的重要来源，也是文人雅士休闲玩赏之地。长庆二年（822），白居易的到来，更是对杭州的城市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休闲成了这座城市的主色调，也引导着这里的商业文化。白居易与后来苏东坡写的诗歌都成了杭州西湖的商业名片。围绕着西湖，杭州从唐代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高品位的消费性城市：餐饮娱乐行业日渐发达，文化气息浓郁，追求精致。

此时，坐贾的实力开始壮大，标志着商人的谋利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的杭商有行商和坐贾之分。一般来说，唐代及其以前的商业主导力量是行商。行商主要是通过长途贩运货物获取商品地区之间的差价；而坐贾则主要依赖经营固定的店铺获取收益。当时的杭州，行商的力量比较强大，比如沈亚之在《杭州场壁记》中说：“顾杭州虽一场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瓠越之宝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④但坐贾力量的增强也很明显，甚至可与行商并论。前文所引“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中，“骈橈”便是指通过水运而来的行商货船，而“肆”则是坐贾的店铺。杭商

④ 沈亚之：《沈下贤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的坐贾之所以较他处为盛,一是因为杭州的消费能力强,只要能够保证货源,就能获得稳定收益;二是因为杭州良好的生活和消费环境所形成的吸引力,使得一部分行商选择留在杭州,形成坐贾的一部分。由于行商主要是赚取地区间差价,而坐贾则要依靠店铺经营致富,所以坐贾不但拓宽和强化了许多行商不宜经营的诸如餐饮、娱乐、邸店等服务性行业,也使得经营走向专业化。行商和坐贾由于经营理念的不同,也体现出了不同的商业文化。

在唐代,古老的坊市制度开始被突破,形成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格局。所谓坊市制度,就是坊与市分离的制度,也就是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分离的制度。坊中不设市,市内没有坊。这种制度开始于西周,是古代国家对市场进行强制管理的制度。这种制度虽然便于政府管理,但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也比较明显。因此,自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被逐渐打破,坊、市分区制度开始瓦解,坊墙被破坏,有的商家开始干脆临街开市。白居易所谓的“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①描述的就是打破了坊内禁止开店和实施宵禁之令的杭州繁华景象。“家家市”“处处楼”更说明这里大小商人云集,本地坐贾和外地行商共同促进了杭州城市经济的繁荣。

①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白氏长庆集》(卷二〇)。

吴越国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南宋王清明在《玉照新志》(卷六)云:“杭州在唐,虽不及会稽、姑苏二郡,因钱氏建图始盛。”当时杭州被称为“西府”,其实就是吴越国的首都。

吴越国自钱镠建国以来,对内实施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并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疏浚西湖,凿井利民,更修筑了捍海石塘,抵御钱塘江潮水的破坏。对外,吴越国实施“保境安民”的政策,使杭州城免于五代时期的刀兵之祸,饥馑之灾,百姓“富完安乐”。和周边许多地区相比,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可谓乐土,他方避乱而来的难民不但为吴越国新增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无疑保证了杭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杭州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超过姑苏(今江苏苏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成为东南第一大都市。

吴越国时期,杭州设有专门负责钱币铸造和管理的机构,以应付因内外贸易而产生的对货币需求的快速增加。这充分证明了吴越国时期杭州商贸的繁荣。时贤罗隐在《杭州罗城记》中所谓“东眄巨浸,辘闽粤之舟楫;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②,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商贸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罗城的建设有保护商旅的用意,也可以看出吴越国对贸易的重视。

②罗隐:《罗昭谏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海外贸易的拓展是吴越国时期杭商经营的一个特色。虽说“海宇分崩,商贾仍无时不通”,吴越国商人仍可到北方以茶叶换取马匹谋取利益,也可

南至闽粤等地,但相比太平年代所冒的风险要大许多,因此拓展海外贸易成为一种内在需求。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是当时吴越国出海的主要港口。

当时的杭商与日本的贸易比较频繁。那时的日本处于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统治时期,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船只出海,因此两国之间的官方往来很少,以民间贸易为主。中村信太郎所著《日中两千年》中说:“仅从日本的史书中所见,前后算来,商船往来有十四次,而实际上恐怕次数要更多。这些往来的船只,全是中国船,日本船一只也没有。而中国船中几乎又都是吴越的船只。”^①当时贩去的货物“以香料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砂金等物为主”^②。除此之外,因为文化交流的需要,佛像、经卷、诗文、历书等也大量输入日本,被日本人争相购买。除日本外,吴越国同新罗、百济、高丽、印度、阿拉伯大食帝国也有来往。比如,在印度曾出土了吴越国的青瓷片,可证两地的贸易往来,《吴越备史》中也有关于从大食帝国进口火油(即石油)的记载等。

苏轼在《表忠观碑》中称赞吴越国“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③。但“贡献相望于道”,虽然换来了和平与安宁,其代价却是不菲,这便造成了百姓沉重的课税负担,也阻碍了杭商的发展。

二、宋代杭商文化和杭商团体的形成

吴越国时期的杭州未受战乱破坏,保有一方繁荣安乐,为宋代杭州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就经济而言,宋代发生了很多具有变革意义的事件,比如雇用劳动的产生、坊市制度的彻底瓦解、行会制度的产生等,这些都具有某种路标的意义。随着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迎来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迅速成长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正是在南宋时期,杭州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杭商团体也正式形成。

(一) 北宋时期商业环境的改善对杭商的影响

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杭州并未受到兵革之祸,相对和平的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杭州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商业更加繁荣,并已超过

①倪连德:《臻闽粤舟楫,通商旅宝货——商业和对外交往》,《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②[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苏轼:《东坡全集》(卷八六)。

了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等大城市，确立了“东南第一州”的地位。商业环境的改善，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一些变革对杭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南宋杭商群体和杭商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 杭州“东南第一州”地位的确立

北宋嘉祐二年(1057)，梅挚出任杭州知州，仁宗皇帝赐诗，其诗起始两句云：“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①。杭州“东南第一州”的说法由此而来。这个“第一州”的评价，不仅指湖山第一，更是指经济繁荣第一。

①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

北宋时期，在技术进步和贸易发展的双重推动之下，作为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的重要港口，杭州的造船业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与扬州、广州、明州并列的四大造船中心之一。传统优势产业，比如丝织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产品也更为精致，常常被作为贡品。部分行业逐渐成长为杭州的特色产业，比如北宋时期杭州的雕版印刷业就非常有名，是当时全国四大印书中心之一，当时的“监本”多半刻印于杭州。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也日渐繁荣。北宋词人晁补之在其所著的《七述》中描述了当时杭州沙河塘一带（今贴沙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宝则璆琳珊瑚、玛瑙砮砮、药化之玉、火化之珠，红黄白绿，磊落满棧。北商东贾，白金不鬻。沙河雨晴月照，灯明席张，案设左右，煌荧远而望之，夺人目睛……”店铺林立的沙河塘一带只是当时杭州繁华的一个缩影，而巨额的财税收入更能体现杭州的经济实力。仅以酒税而言，当时“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②。而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七）记载，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杭州都酒务岁酒课是三十万缗，是全国酒税收入最多的城市。酒税第一，其他商税也是如此。熙宁十年（1077），杭州商税十七万三千余缗，居全国第一，而苏州只有七万七千余缗。由此可见，此时杭州作为东南第一州的经济地位已确立无疑。

②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东坡全集》（卷五七）。

巨额的酒税和商税也说明杭州城市经济发展的某种倾向日渐突出。自中唐以来，杭州作为一个消费型城市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餐饮娱乐业日渐发达，这为南宋时期作为都城的城市特色打下了基础。北宋时期的词人柳永有一首著名的《望海潮》，词中描述了很多杭州的独特之处，也可看做他本人对这座城市的某种解读。“三吴都会”的地理位置，是杭州“自古繁华”的重要原因；“烟柳画桥，风帘翠幕”“重湖叠巘”“云树堤沙”以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是这座城市引人驻足的自然风光；“十万人家”的城市，“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是商业繁荣、市民富裕的表征。同时，杭州又是一个休闲之城、文化之城，“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文人雅士“吟赏烟霞”……实在是人间

天堂。丝绸、奢侈品、茶楼酒肆……这是一个外地人对杭州这座城市繁华商业的最直接感受。按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的说法：“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而“金陵以后服见诛”，从此一蹶不振，而杭州的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势头，其独特优势由此显现。这对杭商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2. 北宋商业环境的改善及其对抗商的影响

杭州商业繁荣的原因并不只在地理位置、环境优势以及未经战乱破坏，更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商业环境的改变，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某些重大变革对抗商的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北宋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对商人价值的肯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氛围，能够激发商人创造财富的动力。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在赋税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田赋退居次要地位，而商税在财政的地位日益重要。统治者对商人的态度逐渐从禁锢转为利用。比如庆历年间(1041—1048)范仲淹曾认为“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与其取之于农而害农，不如“取之于商贾”。^①此类议论表明了统治阶层的财政对商人的依赖。范仲淹对商人的态度也与已往的士大夫有所不同，在《四民诗》中，他曾以商人的口吻感慨贸易之辛苦和重要，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居四民之末。“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②这句具有标志性的诗句表明了士大夫对商人态度的某种转变。无独有偶，苏轼在《上皇帝书》中也表达了对商人的支持：“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③他主张对商人加以爱护，发挥商人在赈灾与防盗贼中的作用。范仲淹与苏东坡都是北宋时期有很大影响的士大夫，并且此二人都曾任杭州知州，他们对商人价值的肯定对抗商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北宋时期，商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商人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商人及其子弟入仕便有了法律依据，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其末流亦有通过买官入仕，以荫及子孙。由于商人握有巨额财富，他们甚至可以通过与宗室贵族联姻，获取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在宋代开始有了“榜下捉婿”一说。

其次，宋代正式形成的坊市合一制度及行会制度极大拓宽了商人的发展空间，壮大了商人的力量，并推动杭商群体和杭商文化的出现。杭州一带

① 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苏轼：《东坡全集》(卷八六)。

的坊市分离制度在唐朝后期就已经被打破,到了吴越国时期“沿街开店”的现象更为普遍。北宋时期,坊市合一制度被确立下来。这种制度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使得坐贾的力量逐渐壮大。坊市制度的瓦解,使他们有了更加自由的交易时间和交易空间,国家对价格的干预也相对松弛,借贷、赊买、典当、合本等资本经营更加多样化和契约化。部分实力强大的坐贾甚至把触角伸到行商的贩运贸易那里,这些现象在杭州这样的商业发达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

坐贾势力的增强是行会制度形成的基础。宋之前也有所谓的“行”,也就是“市肆”“市列”的别称,也是同业人的组织,但这一组织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之下,以地域区划为基础。宋代,“市肆”已经不再是集中同类商品的行列之肆,而是整个市场店铺的泛称,“行”没有了严格的区域限制。这时的行会虽然依然受制于官府,但基本上是靠商人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行会性质。宋代的行会是我国行会的最初组织形式,大商人通过行会对市场的垄断使他们已经有能力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官府和行商相抗衡。^①

第三,生产关系在宋代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使得很多农民可以脱离土地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此时,城市手工业、商业、运输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种需求为雇用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常常被认为是制度变革的前奏,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宋代这种雇用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四,以交子、会子为代表的纸质货币开始流通,便利了商贸发展。北宋时,在四川一带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不久,这种纸币便迅速流通开来。至北宋末年,开封出现了寄附钱物——会子。由于纸质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便于携带和结算,在获得强有力的信用支持的情况下,它的流通大大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杭州是北宋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北宋诸多新生事物的创生和演化之处。不论是重商思想、坊市合一制度,还是雇用关系、纸质货币的流通,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影响,都深刻影响着杭州商业及商业文化的演化。这一切都在南宋定都杭州之后开始了更为精彩的表演。

(二)南宋定都临安对杭州商业的影响及杭商文化、杭商团体的形成

北宋的种种商业制度的确立为南宋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而南宋定都临安则使杭州迎来了历史性机遇。独具杭州特色的商人团体和商

^①魏天安、戴庞海主编:《唐宋行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业文化开始形成。

1. 南宋定都临安对杭州商业的影响

北宋靖康二年(1127)三月,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初一,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史称南宋,年号为“建炎”。建炎三年(1129),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杭州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杭州商业也由此走向第一个历史高峰。

首先,杭州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中心的转移,推动杭州迅速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由政府控制的贸易。皇亲贵族、达官显贵握有大量财富,形成强大的购买力,使得杭州奢侈品贸易达到空前水平,在杭州可以购买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各种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便利的河海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辐辏之地使得国内外各种物资可以迅速向都城聚集,为贸易额的急剧膨胀创造了条件。杭州商业的大部分还是日用消费品,并且形成了众多的专业市场,比如米市、菜市、肉市、鱼市、药市、珠子市,等等。迄今,这些专业市场仍留下了地名痕迹,如米市巷、卖鱼桥、灯芯巷、柴木巷、珠宝巷,等等。因为杭州人口众多,这些专业市场交易额都很大,当时杭州城外有十余处大的日用消费品市场,批发大量米、肉、鱼等基本生活物资,每日仅米一项就有数百吨。^①贸易的兴旺,使得“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②。

其次,杭州的商业文化在汴京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南宋时期涌入临安城的北方人口中有大量来自原来的京师汴梁。其中,除贵族、官僚和士大夫外,还有很多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杭州的商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说:“大驾初驻蹕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商人中“如厢王家绒线铺,自东京流寓,今于御街开张,数铺亦不下万计”^③,而都城的食店也“多是旧京师人开张”^④。这些在临安开的汴京旧店,很多就是服务于汴京来的达官显贵们。达官显贵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杭州人,这些店铺的经营方式也影响着杭州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中云:“今临安所货节物,皆用东都遗风”,而杭城食店也“多是效学京师人,开张亦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熟食店也学汴京样子“插四时花,挂名人画”^⑤。店铺如此,小商贩的经营也仿效汴京气象,“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凡此种种,足见汴京的商业文化对临安影响之巨。杭州的商业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影响下逐渐确立发展起来的。

第三,南宋临安城各行业形成了极为细致的分工。《西湖老人繁胜录·

①[法]谢和耐著:《南宋社会生活史》,马德程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63页。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两赤县市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

④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

⑤吴自牧:《分茶酒店》《茶肆》,《梦粱录》(卷一六)。

诸行市》中云：“京都有四百十四行”，比如腰带匣、读书灯、笔砚匣、了事匣、黄草罩等。从书中所列行当看，分工之细甚至让人有繁复之感，而周密在《武林旧事·小经济》中更列出了诸如班朝录、供朝报、选官图等一百七十七种杭州独有的职业。^①罗列这些行业看似单调，却能描绘一幅当时杭州人的市井生活风情。复杂的分工一方面说明临安城各种产业门类齐全；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产业日趋专业化。这些都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规模较大的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行会组织。这一组织其实就是杭商团体的最初形式，也是坐贾实力壮大的表现。通过行会，商人可以在与政府的商业谈判中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也使行业中的领导者更便于对行业经营进行垄断。

第四，在都城效应的影响之下，临安城的吸引力大大增强，更促进了杭州向典型的消费型城市转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纪遗四·纪事》中云：“国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由于杭州自隋唐以来就有竞奢夸富的风气，此时达官显贵、富商大贾云集此地，奢华之风更盛。南宋时期，临安城的餐饮业、娱乐业、邸店业、房屋租赁业等消费行业都因此获得飞跃发展，一时间名店林立，名品迭出，叹为观止，遂使西湖有“销金锅”之称。同时，临安城又是科举省试、太学补试、举人别试、士人发解试之地，“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②，科举生意特别兴旺。

第五，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速繁荣，作为都城兼重要港口之一的临安“已具有‘国家市场’的雏形”。当时南宋的大船可以远达日本，安南沿海的占城、马来亚、印度南岸及孟加拉湾、非洲沿海一带，贩卖瓷器、纺织品以及茶叶等商品，而孟加拉湾的犀角，印度和非洲的象牙、珊瑚、玛瑙、木材、香料等贵重物品都能在临安的市场上找到。^③

综上所述，由于南宋定都临安使杭州迅速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在北宋汴京商业文化的影响下，杭州商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行业分工日渐细密，行会组织日渐壮大，形成最初的杭商团体；在都城效应的影响下，杭州作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的特色更加突出，消费类产业蓬勃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杭州逐渐成为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杭州商业在南宋时期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

①徐吉军：《南宋临安工商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②吴自牧：《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闹》，《梦粱录》（卷二）。

③〔法〕谢和耐著：《南宋社会生活史》，马德程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59—60页。

2. 南宋时期杭商文化的确立

南宋临安城的商业独具特色,不仅表现在形成了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行业上,也表现在具有杭州特色的经营方式上,形成了独具杭州特色的商业文化。

先看手工业作坊。当时杭州工商并未完全分离,很多手工业者是亦工亦商的身份。南宋时期都城临安的手工业主要包括印刷业、丝织业、陶瓷业、造船业、酿酒业、造纸业、制笔业、制扇业、制盐业等。这些行业不少都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庞大,分工细致,以质取胜,不太计较成本,其产品主要服务于皇室和官府,依靠垄断,没有多少商品的性质。因此,营销并非这些官营手工作坊所长。与此不同的是私营手工业,他们出售的就是自己的产品,这些私营手工作坊规模没有官营的那么大,但人数众多,采用的是雇用劳动,也有着细致的分工和对品质的刻意追求。

就以刻书为例。南宋时期私人所刻书籍量多质优,号称“杭本”。比如廖莹中世彩堂刻本中的《昌黎先生集》和《柳河东先生集》,写刻精美,纸润墨香,在宋版书中被称为“世无二帙”的“无上神品”。与官府刻书不同的是,私人刻书往往选择市场比较好的图书加以刊刻,如南宋杭州佛教兴隆,刻印经书不但销路有保障而且有功德,因此刻印佛经的很多。同时,为了加大图书销量,当时的书商注意广告宣传,比如沈二郎经坊有这样的广告:

本铺今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捡道地山场抄造细白上等纸札,至诚造印,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请赎。谨白。

从这条广告可以看出,沈二郎已经有了很强的品牌意识,今天广告语中的很多要素在这里都已经包括在内。与此相仿的还有中瓦荣六郎等书商。可见当时的书商们不但注重产品质量,也很注重营销手段。

南宋临安城商业的主流是鳞次栉比的店铺、酒楼、茶肆以及流动摊贩,这些商人数量众多,是临安商业的主体,也是杭州商业的特色所在。店铺分类很多,有食店、点心店、凉水店、果子店、酒店、茶楼、汤店、药店、书坊、衣料服装店以及杂货铺等。仅食店又分为分茶店、面食店、羊饭店、川饭店、南食店、素食店、菜羹店等。每类店铺之下又是名店林立,遍布都城各个角落,每一名店又有各种特色产品,可谓眼花缭乱。除店铺外,又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沿街叫卖,出售一些饮料、花卉以及日杂之类货物。

又有不以出售物品牟利的,比如娱乐业和各种服务业,最典型的就是瓦